



中外关系史辞典

朱杰勤 黄邦和 主编



朱杰勤 黄邦和 主编

中外关系史辞典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01号

中外关系史辞典

朱杰勤 黄邦和 主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邮编430022)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44.25

字数：1479.5千 插页：6 印数：1—1 820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216—00980—0/K·121 定价：24.40元

中外关系史辞典

周谷城著

加强中外關係研究
發展中外友好合作

黃華



文化交流是催促人類社會進
步的重要條件之一而文化交
流史或中古歷代文獻辭典
則是交流內容和過程的
具體記錄這一部辭典的
重要意義由此可見

李善林
一九九二年

60696/3

60696/4

主编 朱杰勤 黄邦和

副主编 张劲草 林远辉 张祥晖

主要撰稿人（按姓氏笔画笔顺排列）

马永明	王 谦	王希隆	王厚康	王冀青
卢 菲	丘 克	丘 进	朱 凡	纪宗安
孙庆芳	杨通方	李玉昆	李云泉	吴 煊
余太山	宋 峴	陈 炎	陈玉龙	陈能宗
陈利媛	张 锐	张 敏	张劲草	张祥晖
林远辉	林今水	林友仁	罗晃潮	罗天焕
周中坚	周建业	周洪钧	郝镇华	冒荫寰
钟建建	施亚光	夏应元	钱远鎔	徐善福
郭 崇	晏昌贵	黄 靖	黄 煌	黄邦和
黄国安	黄滋生	黄德馨	康右铭	舒 焚
葛治伦	葛振家	韩廷杰	谢孝苹	潘企麟
潘淑钰	戴 军			

序

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遗世独立，它必需而且也必然迟早会和其他国家发生关系，中外关系史的任务就是研究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发生和发展。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包括和平关系和战争关系。和平关系表现在两国政府建交，讲信修睦，双方人民进行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战争关系表现在兵戎相见等暴力行为。在人类历史上国与国之间的和平时期比战争时期要长得多。因此，研究中外关系史应该以和平关系为主，也不讳言战争关系，全面反映客观的历史事实，提供经验教训。两国之间，无论和平还是战争，都关系到人民利益和国家命运，我们不能不认真对待。古语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又说：不有国，何有家？不有人，何以立国？国家和人民是一体的。作为一个爱国公民，最好学习一些中外关系的历史，以便总结和运用历史的经验教训，有效地执行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开放政策，加速改革，促进四化，把祖国建成富强康乐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团结以平等待我的民族，争取持久的和平。

中外关系史作为一门有科学体系的专门学科，进行全面和系统的研究，虽然始于19世纪，但古代中国史学家中已有很多非常重视外国历史和现状，而且有不少涉及中外关系史的著作流传后世。例如汉代伟大史学家司马迁，是一个留心外事的人。他的史学思想和方法就是主张“网罗天下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衰之理”。他所谓“天下”，并不限于华夏或中国，而认为中国以外的国家亦应研究，不仅应该博通古今，还必需沟通中外，目的在吸取经验教训，见于行事。他的《史记·大宛传》，就是叙述汉代

由中国到西亚各国的事情；有关中外关系的还有《匈奴传》和《张骞传》等。《史记》一书可称为以中国为主体的世界史，同时也是具体而微的中外关系史的雏形。班固的《汉书·西域传》又为中外关系史研究提供更多的参考资料，如《西域传》内的安息（今伊朗）条中，不仅标出它距离长安若干里，而且记载中国和安息交换使节的情况，不厌求详，有声有色。以后历代王朝编撰的“正史”，史官多仿马班旧例，特辟外国传来记载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至于历代有关中外关系的私家著述之多，更难悉数。我们只能择优著录：例如关于中印关系的有晋代法显撰《佛国记》，唐代玄奘、辩机著《大唐西域记》（中华书局有季羡林等的校注本）。关于中朝关系，有宋代徐兢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关于中日关系，有明代李言恭、郝杰撰的《日本考》（中华书局有汪向荣、严大中校注本），及清代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关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有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番志》（中华书局有冯承钧校注本），元代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中华书局有夏鼐校注本）、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中华书局有苏继庼校释本）、佚名的《元朝征缅录》，明代黄衷的《海语》、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上二书中华书局有冯承钧校注本）、巩珍的《西洋番国志》（中华书局有向达校注本）、黄省曾的《西洋朝贡典录》（中华书局有谢方校注本）、张燮的《东西洋考》（有谢方校点本）、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茅瑞徵的《皇明象胥录》、清代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有李长傅校注本）、谢清高、王炳南的《海录》（有冯承钧校注本）。关于中国和中亚、西亚关系的，有元代丘处机、李守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耶律楚材的《西游录》、清代徐松的《汉书西域传补注》。关于中国和欧美关系，有清代《平定罗刹方略》、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缪枯孙的《俄游汇编》、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张荫桓的《三洲日记》、梁廷枏的《粤海关志》、容闳的《西学东渐记》。我国是数千年文明之邦，史籍最为丰富，有关中外关系史的专门

著作有数百种之多。对这项研究有巨大的参考价值。我国中外关系史研究具有这样的优秀学术传统是有理由的，略纾管见如下：

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他们以仁为本，以和为贵，“善与人交”，以信义著称，出洋的华人亦能入国问禁，入乡随俗，尊重当地民族的感情和风俗习惯，与他们和平共处，协助他们开发资源，建设社会，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和尊重。由于时代的局限，中国历代王朝的一些统治者难免有大国主义思想，但他们还是执行绥远方，柔远人的政策和交往尚厚往薄来的外交措施。有时或因藩邦背盟挑衅，不得已而用兵，但对方表示悔过求和，就很快“化干戈为玉帛”了。有些外国人见中国古代文献称距离中国较近的人为“夷”，误以为鄙视别国之人，其实根据《尚书》、《周礼》等书，夷之一字，有“大安”之意，有平等之义。夷本来是泛指东方的人民，古代的东夷，包括莱夷、淮夷、徐夷。在古代，莱夷是指今山东省的人民，淮夷是指淮河流域的居民，徐夷是指今山东南部、江苏安徽的北部居民，可见夷之一字不是贬词。中国人民对于世界各族人民向来一视同仁，相当尊重。对于外来的宗教，如祆教、摩尼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亦任其传播。虽然明清之际，王朝由于国防的需要，短期内实行海禁政策，但国际往来基本上还是正常的。有些人认为中国在漫长的时期，都是实行闭关政策，这不符合我国历史情况，上面举出的那些古籍就可以证明。从秦汉以来，我国和东西方各国的接触和交往是史不绝书，这些历史事实不断为我们研究中外关系史的人提供素材，逐渐打下雄厚的基础。发展到19世纪，中外关系史就逐步形成为一种有比较完整体系和综合性的学科，表现在下列特点。第一，史地结合，突出史裁。人类创造历史离不开地理环境。所以研究历史必须具有地理知识，特别是人文地理和沿革地理。研究中外关系史的人也必须具有中外地理知识，才能史地

结合，突出史的内容和作用。例如清代李光廷的《汉西域图考》，是一部用沿革地理来论述汉代与西域关系的史书，此书印行于1870年（同治九年），附有用西法绘制的西域图，以补文字说明之不足。可见中外关系史研究离不开辅助学科。第二，中外关系史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中国进行研究，外国也进行研究，双方观点和目的虽有所不同，但学术交流和争鸣的结果，自然有助于这门学科的全面发展。自鸦片战争后，外侮迭来，中国爱国知识分子多留意外事，魏源1852年出版的《海国图志》一百卷，就是利用本国文献和外国历史材料（如《四洲志》）编写的。徐继畲同时也搜集中西文献资料写成《瀛环志略》附图十卷，于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出版。梁廷枏的《粤海关志》、《粤道贡国说》及《夷氛闻纪》等有关中外关系史的专著也相继问世。梁氏之书，除参考古籍和档案外，还参考英文报刊及中西交涉的各种文件和记录的汉文译本。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列强最引起清朝当局警惕的是英国和俄国。关于中英关系的著作相当多，前面已有介绍。关于中俄关系的著作，比较有参考价值的有何秋涛之《朔方备乘》六十八卷，附地图多幅。稍后有缪枯孙撰的《俄游汇编》八卷。缪枯孙于光绪十三年（1887）奉使游历俄罗斯国，归而撰《俄游汇编》，记述俄罗斯民族的源流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和俄罗斯侵略中亚始末，还附有俄国疆域表，水陆交通及水陆军建制情况，特别是各大省市地区都附上中俄名称和经纬度。何缪二氏之书，一详于古，一详于今，各有所长，均为研究中俄关系必备的参考书。晚清学术界对蒙元史和西北史地的研究亦盛极一时。研究的人目光不限于新疆、蒙古；而且远及中亚、西亚和欧洲。因为蒙古势力曾一度远及中亚、波斯、叙利亚、俄罗斯及欧洲等地。研究蒙元史和西北史地，就可以进一步了解13世纪中国与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对于巩固边疆，防止沙俄的侵略，有借鉴之处。洪钧所著的《元史译文补证》一书，证者证元史之误，补者补元史之

阙，所谓译文即利用外国文献资料，从事考证补遗的工作。洪氏本来不懂外语，他通过译人的帮助，吸取英、法文有关著作入书，为以后治蒙元史者开一先例。我们研究中外关系史，必须有科学思想和方法，博览中外有关史料，加以综合分析比较，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抽出科学的结论，反映历史真相，进一步探索其发展规律，应用到社会实践中去。人称中外关系史是一门经世致用之学，其故在此。第三，作为一门有科学体系的专门学科，中外关系史的要求高，难度大。早期对之研究的人不多，发展比较缓慢。可是到20世纪，由于国际形势的急剧发展，我国人民对于中外关系的变化多表示关切，中外关系史的重要性也逐渐显示。形势迫人，有远见的爱国知识分子越来越多的投入中外关系史研究。老一辈的学者如王国维、陈寅恪和陈垣都是博通中外，世界驰名的大师。他们除在文史上有独出冠时的创造外，对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也都有过倡导和示范的作用。例如王国维先生对于匈奴史、蒙古史和西北史地均有重要论文发表；对于有关中外关系的古籍，如《蒙鞑备录》、《黑鞑事略》、《圣武亲征录》、《长春真人西游记》、《王延德使高昌记》、刘祁《北使记》、刘都《西使记》等书，王先生都有笺证或校注，并且加以序跋，考证精辟，议论笃实，有很大学术价值。陈寅恪先生治唐史，“称绝诣，通梵语及英、法、德多种语言，对于中印文化交流尤所究心。”忆陈先生在中山大学任教时，向达先生因注《大唐西域记》，专程来粤向陈先生请正。陈先生对于中外关系史的著作虽然不多，但极力提倡西北史地的研究。他说：“惟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沈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序朱延丰《突厥通考》）我们认为经营西北，自然包括西北史地问题，即研究西北与西域的交通和关系问题。我国中外关系史专家往往以研究西北问题为开端，以研究中外关系史为归宿。陈先生寥寥数语对研究中外关系史的人是有鼓励作用的。陈垣先生

治史，方法谨严，其史学论著以中外关系史和宗教史为多，如《元也里可温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基督教入华史略》、《回教入中国史略》、《释氏疑年录》、《元西域人华化考》、《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吴渔山生平》、《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书，议论平实，考证精翔，使人开卷有益。

20世纪20、30年代间，中外关系史学界中涌现出一批承先启后的专家学者，有冯承钩、张星烺、向达、岑仲勉、方豪等。冯承钩将法国汉学大家的著作系统地译为汉文，约有百种，以多桑《蒙古史》译得最好，还译有沙海昂的《马可波罗游记》，加以注释，甚为详备。至于篇幅较短的译文，都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1—9集。他还有自撰的考证论文多篇，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张星烺先生中西交通史造诣独深，他曾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厦门大学等校教授，主讲中西交通史。1913年，他曾将玉尔校注的《马可波罗游记》两卷本的导言及第一卷的一部分译为汉文，张氏还在导言中增补一些关于马可波罗及其书的材料。此书于1929年出版。惜未见其续译全书。他的代表作是《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原出版于1930年。其后继续搜集有关史料准备补充。1977年中华书局将原书和他后来搜集的资料合在一起，加以整理校订出版。向达先生直谅多闻，令名卓著，对于中外关系史精研有素。行世的专著有《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这部论文集收入有关中西交通史的论文23篇，约50万言，可称为向先生治史的结晶品。还有《蠻书校注》一书，也是其精心结构之作。他在30年代曾写了一部《中西交通史》，这部书虽然篇幅不多，而且仅限于古代，但叙事比较全面，条理井然，每章附有参考书和问题，可以作为中外关系史的初级教材和自学的参考书，对后学有启蒙作用。岑仲勉先生是隋唐史专家，著述宏富，他对于中外关系史的贡献，具体表

现在下列已出版的著作，如《佛游天竺记考释》、《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突厥集史》、《中外史地考证》、《汉书西域传地理考释》、《敦煌于阗古文件考释》等书。岑氏晚年潜心学习马列主义，力图运用它来指导研究工作，这种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是值得钦佩的。方豪先生长期从事宗教活动和宗教史研究，精通英法语，熟悉拉丁文。他对基督教传入中国史有湛深的研究，特别是对耶稣会士来华的经过及其活动知道很多。他的《方豪文录》正补篇三卷中绝大多数文章都与此相关，可供参考。他著有《中西交通史》二巨册，内容充实，颇有影响。

以上介绍的几位中外关系史的老专家，都是我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们脚踏实地为我们带路，让我们踏着他们的足迹前进吧！

本世纪初，中外关系史作为专门史之一种的学科名称早已成立，但沿用之人不多，最惯用的还是中西交通史，例如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书，就把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和非洲各国关系的史料都搜罗入去，而不局限于欧洲。方豪的《中西交通史》所涉及的范围和张氏之书一样。他们这样做法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从中国出发到西方，由陆路去就要经过中亚和西亚；由海路去就要经过东南亚和南亚各国，把这些国家纳入中西交通史的范围，也是言之成理。我本人过去也惯用这个名词，后经师友的启发和自己的考虑，才赞成采用中外关系史这一名词。因为中外或中西交通史一词容易使人认为只限于水陆交通方面。并不包括两国之间的战争关系及和平关系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重点。而且今天国际关系越来越复杂，不是和平，就是战争，交通问题只是国际关系中一个侧面而已。中西关系史或中西交通一词，如果仅以中国和欧洲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未尝不可采用，但如包括亚洲和非洲等国而相提并论，就会使人发生误解。我们认为还是用中外关系史作为学科的专有名词，就比较名实相符，

有概括性和科学性。

中外关系史研究范围既广，问题又多。现代的专家们往往从个人的兴趣和专长出发，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获得伟大的成绩，著名当世。例如汤用彤、季羨林、任继愈、常任侠、李长傅、温雄飞、陈序经、饶宗颐、章巽、田汝康、许云樵、方国瑜、江应梁、姚楠、张礼千、陈育崧、韩振华、王芸生、汪向荣、张维华、朱谦之、唐长孺、白寿彝、翁独健、孙毓棠、纳忠等等都在一个或几个方面独步在先。另外，还有大批著名专家，卓有建树；海外华人学者中也有很多人成果累累，均不及一一列举。新中国成立后，研究中外关系史的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成果的数量与质量，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呈现欣欣向荣气象，这是非常可喜的事。

由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国家建设的需要，全国研究中外关系史的学术机构和学术团体，也如雨后春笋。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和沿边省份的社会科学院系统以及国内许多大学，都分别成立了专门研究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所、研究室，或成立了专门研究中国与个别国家关系史、中国与个别地区关系史的研究机构。民间组织的研究中外关系史的学术团体，如中外关系史学会、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等以及一些中国与个别国家关系史研究会等，总计也有数十个之多。这些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一方面培养了大批研究中外关系史的人材，同时也推出了大批的科研成果。近年来，尤其对与周边国家关系史的研究，为我国的睦邻政策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贯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近年来，我国有关中外关系史著作的出版工作也日臻繁荣。中华书局特辟《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及《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特请专家校注整理或翻译注释，正在陆续出版。其他出版社也出版不少有关著作或教材。关于中外文化交流的有：周一良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阎文儒、陈玉龙编的《向达先生纪念文集》、沈福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还有《中外交通史》、《丝绸之路》

等，关于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的有：潘光旦的《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历史研究会编的《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集》、还有《泉州伊斯兰教石刻》、《摩尼教及其东渐》、《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等；关于华侨史方面已出版的有《印度尼西亚华侨史》、《印尼华侨史》、《菲律宾华侨史》、《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美洲华侨华人史》、《美国华侨史》等；关于高校教材方面的有《近代中外关系史》、《明清之际中西关系史》、《中越关系史简编》等。以上各书，都是有所发明、有所创见，能于中外关系史学中，独树一帜。

我们研究中外关系史必须尽可能地占有中外有关资料。所以史料的整理、编辑和出版，对研究者极为有利。近年来这类书已有多种出版，如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菲律宾资料汇编》、汪向荣、夏应元编《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陈显泗、许肇琳等编《中国古籍中的柬埔寨史料》、黄国安等编《近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方积根编《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肖致政、杨卫东编《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余士雄编《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等。此外，如冯承钩编，陆峻岭增订的《西域地名》、陈佳荣、谢方、陆峻岭合编的《古代南海地名汇释》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所编的《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均为中外关系史必备的参考书。

我国中外关系史研究虽然属于冷门的学科，但从上面所举的迹象看来，如研究队伍的由弱到强，研究范围的由小到大，研究成果的月异日新，逐步提高，学术机构和学术团体的相继建立，有关书刊出版盛极一时，可见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发展颇为迅速。如果说中外关系史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我们早已达到国际水平了。

我学习中外关系史垂六十年，但因屡经忧患，成果有限，迄今年老体弱，来日苦短，恐怕不能为中外关系史研究多做工作

了。中外关系史研究发扬光大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年富力强的研究队伍身上。据我体会，中外关系史研究最可贵之处和值得重视的原因，就是它能够实事求是地说明中华民族对世界人类文化的伟大贡献，并指出中国在世界历史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激发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尊心，使其热爱祖国和人民，共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一方面从爱国主义出发，尽快地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康乐的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从国际主义出发，进一步为全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我既与中外关系史结不解之缘，决定以改革的精神，利用晚年有限的岁月，总结数十年学习的经验，重新撰写一部中外关系史，还要继续培养这门学科的接班人，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最近史学界有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建议集体编写一部《中外关系史辞典》，以供参考。我认为至今尚无此类工具书出版，表示赞成，并参预其事。随着今天四化建设的开展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关心外事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要求对中外关系史有所了解。我们为适应上述需要，特编此书，来介绍中外关系史的基本内容和专门词汇，以省读者寻书索解之劳。中外关系史的专家们纷纷响应，大力支持，惠然赐稿，盛意可感。我们谨在此对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中外关系史辞典》是一部中型专科词典，无前例可循。我们学识有限，经验缺乏，自难免有错误和缺点，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朱杰勤

1988年5月